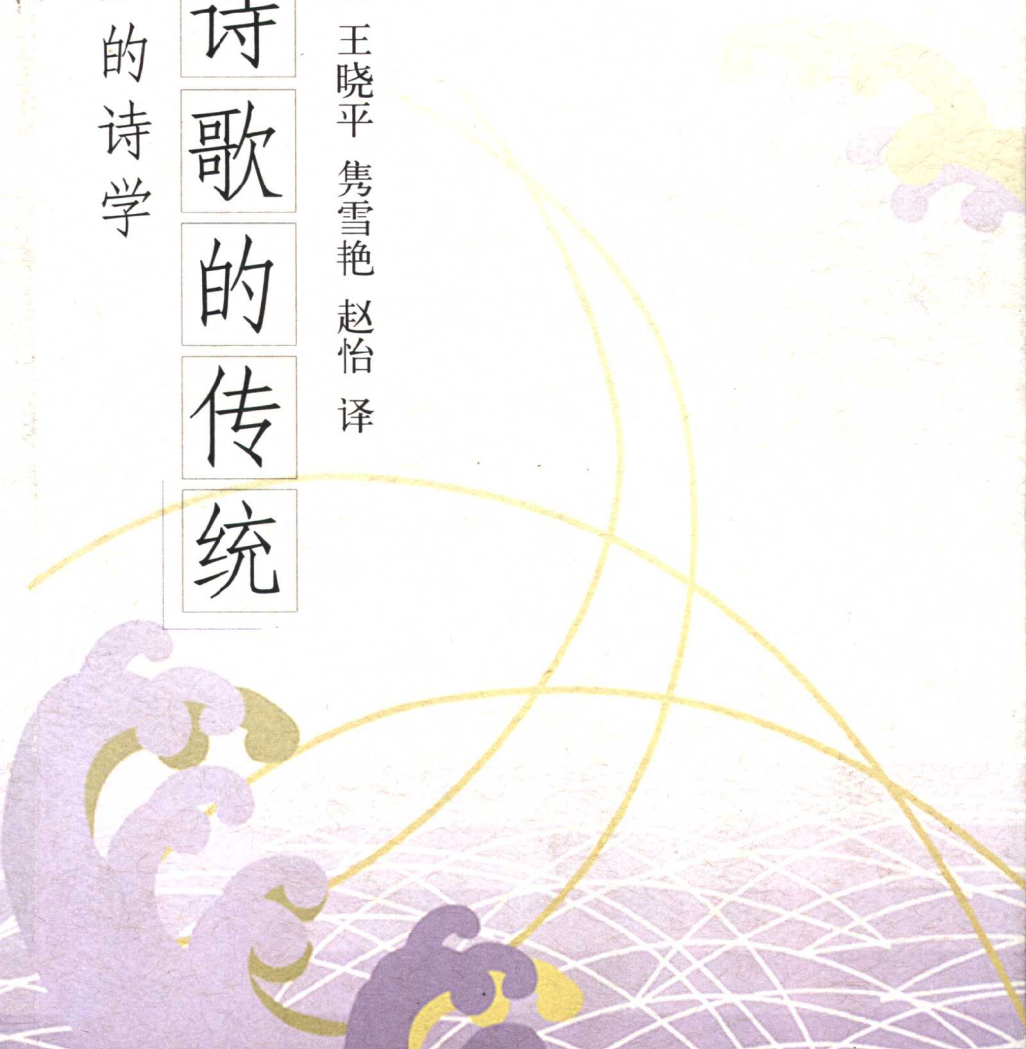


译林出版社

〔日本〕川本皓嗣 著 王晓平 雫雪艳 赵怡 译

日本诗歌的传统

——七与五的诗学



译林出版社

〔日本〕川本皓嗣 著 王晓平 雫雪艳 赵怡 译

日本诗歌的传统

——七与五的诗学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日本诗歌的传统——七与五的诗学/(日)川本皓嗣著;王晓平,隼雪艳,赵怡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3
ISBN 7-80657-734-3

I. 日... II. ①川... ②王... ③隼... ④赵...
III. 俳句-文学研究-日本 IV. I313.0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23365 号

NIHON SHIKA NO DENTO

by Koji Kawamoto

© 1991 by Koji Kawamoto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1991 in Japanese by Iwanami Shoten, Publishers, Tokyo

This Chinese (simplified)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in 2004

by Yilin Press, Nanjing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author c/o Iwanami Shoten, Publishers, Tokyo

登记号 图字:10-2003-093号

书 名 日本诗歌的传统——七与五的诗学
作 者 [日本]川本皓嗣
译 者 王晓平 隼雪艳 赵 怡
责任编辑 张远帆
原文出版 岩波书店,1991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网 址 <http://www.yilin.com>
地 址 南京湖南路47号(邮编210009)
集团地址 江苏出版集团(南京中央路165号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江苏新华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4.625
插 页 2
字 数 306 千
版 次 2004年3月第1版 2004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657-734-3/I·527
定 价 29.8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中文版序

川本皓嗣

承蒙天津师范大学、帝塚山学院大学教授王晓平的关照，拙著《日本诗歌的传统——七与五的诗学》（岩波书店，1991）的中文版问世了。这虽是继 2000 年出版的英文版（*The Poetics of Japanese Verse: Imagery, Structure, Meter*, University of Tokyo press/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之后的第二种外语版，但是联想到迄今中国与日本关系之亲密，联想到日本文化从中国文化受惠之巨大，中文版的刊行仍使我感慨良多。

本书主要就和歌与俳句这些日本古典的（而且至今生机盎然的）诗歌形式展开论述。阐述了它们的主题与诗语（特别是季语）、俳句特有的符号论意义上的结构及其以七五调为中心的韵律。论述和歌与俳句的著述不计其数，要说到本书的特色，恐怕在于它不仅是将它们作为日本固有传统的部分来加以把握，而且是把它们作为所有文化都相通的“诗”的一种，从普遍诗学的视角来加以把握。

因而本书将西方诗歌、中国古典诗歌等等都纳入视野，考察的一个问题，就是和歌和俳句在仅有三十一音或十七音这样狭小的空间里，何以成其为“诗”的。而且，如果将和歌、俳句这样极端短小的作品（至少其中的优秀作品）看作是诗的话，那么其中便毫无余地容纳“诗”以外的要素，例如叙述故事，设计情节以及思考、描写这些其他艺术体

裁里可能具有的要素。换句话,和歌、俳句除了是“诗”之外,就一无所有。可以说,中国的五言绝句这样的短诗型,大体也是一样吧。因而,探讨短诗的“诗”,也是认识一般的“诗”为何物这一根本问题的一种尝试。

在第一部分中我主要论述的是:“秋日黄昏”是日本代表性的诗语,也是诗的主题,它常常伴随着“寂寥”这一“本意”(在文化之中确立、固定下来的含意与联想),我追溯了它在文学史上演进的轨迹,论述了这种含意受到限定的诗语在和歌、俳句这样的短诗中,是怎样起着惊人作用的。在平安时代“秋日黄昏”被认定是“寂寥”的,不用说,在其背景当中,存在着来自中国诗赋“悲秋”的强烈影响。

第二部分以芭蕉的俳句为对象,分析了瞬间迸发“暗示”火花的俳句,在内部具有怎样的文体论意义上、符号论意义上所讲的结构。俳句是由两部分构成的,一部分是由夸张(重复)和矛盾(对立)这样的文体特征(非普通寻常的表现方法)来引起读者兴趣的“基底部分”,另一部分是由“基底部分”里起作用而暗示出一句整体意义方向的“干涉部分”。在“干涉部分”里为了易于理解其意思,多使用含意固定的季语(例如寂寥的“秋日黄昏”),而且与“基底部分”相对“干涉部分”的意义论上的关系,也依然采用夸张的或矛盾的(或者二者兼有的)形式。

第三部分阐明了以七音或五音这种节律分节为基础的和歌与俳句(以及近代诗的一部分)的韵律及其深层结构。一般认为,七五调等日本诗歌的韵律与以音节强弱和

长短为基础的西方诗歌不同,是仅以音节为基准的“音数律”。但是严密来说,仅仅反复一定的音节数,由于没有一个明确标识来表明一个节律分节与下一个节律分节的交接处,因而便不能支撑起读者的节律感。

实际上在所谓音数律的深层存在着借助于没有语音的“休止”拍与潜在的“韵律强弱重音”的“二音一拍四拍子”的节律框架。日语的音数律虽与同样以音节数为主体的法语诗歌韵律多有相通之处,但可以认为与之更为接近的,则是中国古典诗歌的韵律。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中国诗歌也具有七音节、五音节这样的节律分节,(可以说由平仄这一声调上的重音做着强化与补充)基本上也遵循着音数律的。日本与中国古典诗中长诗很少,或许原因正在这里。

我现在担任着会长的国际比较文学学会(ICLA),本定于2003年8月在香港举行三年一度的国际大会。王晓平教授热心安排拙著中文版的翻译,争取在大会召开之前出版。遗憾的是由于“非典”的原因这次大会延期至2004年8月召开。当我想到身为主办者竭尽全力筹备大会的印第安纳大学、岭南大学欧阳桢教授以及相约对大会全面协助的乐黛云教授、严绍璁教授、孟华教授、刘象愚教授、周小仪教授等可贵的努力,便感到不胜遗憾。但是,香港大会只是延期一年而非中止,而且因此时间更为充裕,可以使本书译文精益求精,这又是不幸中的幸事。

更为幸运的是,本书是由我求之不得的极有缘分的三位杰出日本学学者翻译的。王晓平教授1995年作为东京

大学研究生院综合文化研究科的特别研究员到日本的时候,我万分荣幸地担任过他的指导教授,而且想不到我从东京大学退休以后,从2000年到2003年,我们又成了帝塚山学院大学的同事,我有了机会与王教授亲密交往。王晓平教授站在日本文学研究第一线,我不仅与他在中日两国的国际会议上数度会面,而且2001年钱林森教授策划《跨文化丛书——外国作家与中国文化》,我也参加了策划,而王晓平教授则执笔写作了日本卷《梅红樱粉》。

与清华大学雋雪艳教授的交往,是她1998年在东京大学研究生院学习时。我受其导师三角洋一之托,担任了她有关藤原定家歌学书的博士论文审查委员。(该论文2002年由汲古书院出版,书名是《藤原定家〈文集百首〉的比较文学研究》。)雋雪艳教授对本书译文推敲润色的时候,正值“非典”肆虐,其间辛苦,超乎想像。

现住在东京并在几所大学从事中文和中国文学教学的赵怡,在东京大学研究生院攻读比较文学比较文化的时候,我担任过她的导师。赵怡受过严格的学术训练,通晓法语、英语、日语,对鲁迅、周作人进行的日本近代文学翻译、中国近代杂志上刊载的法国象征诗歌进行过深入研究,眼下正准备撰写有关中国遣欧使节记载的论文。

三位先生对难解难译的短诗型及其烦琐考证驰骋译笔,谨让我致以诚挚的谢意;同时也衷心希望爱诗的中国读者能从本书中找到自己期待的东西。

(王晓平译)

译者序

王晓平

这里敬献给读者的是一部用世界文学眼光审视日本诗歌传统的著述,我相信,它不仅会给研究日本文学、中国文学以及比较文学的学者提供某些启示,也会使对这些领域感兴趣的人,带去含英咀华、共赏奇文的乐趣。

—

日本人一听“东大”(东京大学),便免不了肃然起敬,再一听是东大名教授,那就是敬上加敬了。所以东大名教授要是摆起架子来,该说是“登峰造极”了吧。不过,川本皓嗣先生可能属于不会摆架子的那种类型。

本书的著者,现任国际比较文学学会会长、日本比较文学学会会长、东京大学名誉教授、大手前大学校长的川本皓嗣,从我认识他那一天起,就没看出他的架子来。资历深了,威望高了,依然是谦和依旧。读他书的感觉,与和他对面交谈的感觉没有什么两样。

1995年至1996年,我在东京大学做访问学者,指导教师就是川本先生。那时,他正担任比较文学文化研究所所

长。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那里学术规范意识很强。研究所召开的讲习会，师生共同给即将提交的博士论文“会诊”。没有恭维，也没有贬抑；没有高谈阔论，也没有慷慨陈辞，只是一处一处地指出：这里表述欠妥，这里是“孙引”（没看原著，辗转引用），这里依据不足。每个人都像手里握着镊子剪子，像要从那原稿里镊出一个弹头或剪下一块腐肉似的。我想，坐在那里的作者心里肯定有痛感，汗会出透。好文章对作者来说，如同自己的孩子，那“阵痛”之后，则可能生出一个“好宝宝”来。由这，我又感到，在川本先生谦和的背后，还有一股严谨的力量。

其实，谦和也好，严谨也好，对本人来说，都不过是自然流露。远游求学，追求新知，就如驾舟出海，舟一离港，自觉学海无涯，那谦和与严谨便缺少不得。川本曾留学巴黎大学，做过多伦多大学客座教授、印第安纳大学高等研究所特别研究员，还有用英语写的学术著作。但他谈到掌握英语的感受时还是说：“英语是美妙的，很多人以为自己英语马马虎虎够用就行了。其实，山外有山，不论走到哪一步，那都离放心大胆的境地远着呢。学无止境，没有别的办法，对外语只能谦虚地孜孜不倦地啃下去。”记得一次在他的研究室里，我们俩正在谈话，进来一个留学生，吞吞吐吐地说实在没有信心学先生教的意大利语，川本始终不改谦和，劝他不要泄气，坚持学下去。那学生大概本想请求先生高抬贵手，一看没戏，便快快地走了。不光是英语，任何一种外语，任何一种不同的文化，不都是这样吗？都只能一辈子“谦虚地孜孜不倦地啃下去”。

近年来,川本先生在多种场合还特别强调,面对英语越来越成为一种世界通用语言的局面,我们有必要互相学习邻国的语言、那些日常生活中使用的口语,彼此欣赏对方国家用口语撰写的文学。实际上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正越来越显现出来。特别是对于我们从事比较文学比较文化研究的人来说,作为我们比较研究对象的民族的语言,有关它的听说读写的严格训练,是不可缺少的基本功。记得严绍璁先生曾经主张,学习比较文学的人要亲自做些翻译,我是非常赞同这种意见的。我想,如果有条件,还应该有一些从事学术口译的实践。

川本先生很关注中国比较文学研究事业的发展,曾多次到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天津师范大学等处讲演或出席国际会议。在和笔者的对谈中,特别谈到开展中日比较研究具有的重要意义。他说,中日之间虽然有很长的文化交流的历史,但是两国还没有很好地相互了解。“以前日本憧憬中国文化,学习中国文化,但日本人没有接触中国人,是靠书本去学习,我想日本人是不懂得中国人的,因为书本只是原则。日本人在误解中国人,中国人也在误解日本人,相互恼火,说对方卑鄙。相互接触之后,就会明白,原来是一样的,慢慢也会明白,有这样的社会,这样的不同,大概会了解相互不懂的地方,接触的愿望就会更强烈。”(拙作《梅红樱粉——日本作家与中国》,宁夏人民出版社,2002年,对谈《友邻型文化关系还有多远》)他还提出具体从相互积极学习对方的语言入手,从现当代文学到古典文学交流入手,从加强对对方文学理论的研究方面入手,

推进交流与研究深入的主张。应该说，不论政治经济风云如何变幻，中日两国地域文化学的相邻位置是不会改变的，了解对方是从今以往永恒的需要，而促进这种了解，便是两国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应做的工作。

在和笔者的多次谈话中，他反复强调各种文化平等交流的重要，特别是东西文化以及东方各种文化之间相互友视、平等对话的重要。他还曾就在北京参加研讨会的感受坦率提出意见说，看到有些年轻的老师在谈论西方文学理论的时候，一定要把中国古典提出来，这种强烈抵抗的姿态，令人吃惊也令人感动。与西方理论相似的东西，中国历史上有没有，把它找出来，说我们的好，我们的更为古老，又有哪些不同。他认为，这里有坚强的一面，令人羡慕。然而，仅以这样的方式对付外来压力，就缺少警戒感，缺少敏捷性。总把旧东西拿出来，用于彼此较量，并不能把它向前有所推进。我想，面对文化国际化的大势与西方强势文化的巨大压力，正在不断思考如何通过学习增强自身实力的中国学者，一定会从积极方面来倾听川本先生提出的见解。实际上，在本书中，就既贯穿着东西文学观念平等对话的精神，也不乏对付外来压力的警戒感和敏捷性。这种警戒感和敏捷性是通过他对和歌、俳句独到的阐释来体现的。

二

川本的研究肩担两头，一头是欧美诗歌，著有《解读美

国诗歌》，编著有《美国诗歌选》、《翻译的方法》；一头是日本古典诗歌，他所著的《日本诗歌传统——七与五的诗学》曾获得三得利学术奖、小泉八云奖，编著有《歌与诗的系谱》、《芭蕉解读新书》等等。而用英文撰写的《日本诗歌的意蕴》则是将两头融合的结晶。另外，他编著的《文学的方法》则被评为“世界文学的地平线，最前沿的理论”。如果硬要举出最能代表他的研究风格的一项的话，似乎可以举出他对江户时代俳人松尾芭蕉的解读。

松尾芭蕉的最大贡献，是超越谈林俳风，将诙谐滑稽的游戏性诗体俳句变为一种足以玩赏的艺术形式。由于他在日本文学史上的突出地位，研究他的著述也层出不穷。芭蕉在创作中借鉴了杜甫等中国诗人的艺术手法，所以从比较文学角度加以研究的，也已经有了仁枝忠的《影响过芭蕉的汉诗文》、广田二郎的《芭蕉与杜甫——影响的展开与体系》、太田青丘的《芭蕉与杜甫》和曹元春的《杜甫与芭蕉》等。川本研究与它们不同的是将视野扩大到西方诗歌世界，从日本诗歌的内部传统上来解读芭蕉。

从宏观上来看世界诗歌，日本仅有三十一字的和歌和十七字的俳句这样的定型短诗，确实很特殊。正是因为这种特殊性，明治初期的欧化主义者主张将它们一网打尽全部废止。同时，也正是因为这种特殊性，又有一些人以为日本诗歌外国人都读不懂。川本则认为，前一种看法自然大谬不然，后一种看法也结论过早。不管怎么特殊，诗歌既然是语言创作的，诗歌就是诗歌，读和歌俳句的欧美人和读英诗的日本人站的是同样立场。也正是因为日本诗歌有它

的特殊性,就必须说明它之所以特殊的原因。川本研究的
目标之一,就是将和歌俳句置于诗歌普遍的理论来探讨。
不过,这种探讨并不是用外来的尺度来裁断,而是致力于
从内向外用相互融通的话语来阐明。例如,他将和歌俳句
与世界各国诗歌韵律类型作了比较,指出日本诗歌中“音
数律”是一个特殊的例外情况,而单纯的音数律并不起作
用,与字音资格相同而支撑韵律的“休止”,以二音为一拍
的“拍子”,以及作为其全部目标的“韵律的强弱语调”,
都起着辅助的作用。

什么是诗歌?关于诗歌特征的议论可谓多矣。川本用
最简单的话来概括,将它归结为表达的意外性和意义的不
确定性。芭蕉之所以在这种不确定性中游刃有余,是因为
他发现有时俳句这种短诗为了具有稳定的结构要与“本
意、本情”相联系。短诗只能是诗的精髓。川本高度赞赏
芭蕉在追求表达意外性上的矛盾和夸张手法。“幽静时,蝉
声沁入岩石”是芭蕉的名句。声音本是无力的东西,浸
透到坚固的岩石当中,夸张的对照或者矛盾,首先使人吃
惊。但是从矛盾方面来说,日语中本来又有“蝉时雨”的
说法,也就是蝉声就像秋末冬初时下时停的阵雨,有把蝉
声感受作液体的传统,由此可以联想到它浸透到岩石当
中。这里再加上一个更大的矛盾,那就是把喧闹的蝉声若
无其事地说成是幽静。解读这一点,关键就在于“本意、
本情”。这是从中国传来的根深蒂固的传统,不鸣的乐器是
最好的,听得出无音之音的人最了不起,这里有老庄和禅
的认识在里面。更为接近的是梁代王籍的诗句“鸟鸣山更

幽”。鸟鸣山更幽的矛盾,正是人的心理。

川本说:“支撑诗歌语言的意外性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这不是单纯的形式和诗体问题。诗歌就必须是一种永久的革命。新的就会变得陈旧,芭蕉极为敏感地懂得这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川本还特别指出,芭蕉能在意外性上游刃有余,正是因为他深深扎根于“本意、本情”之上。不管怎样扩散,追求着意外的新鲜,芭蕉都决心要回到日本人的“物之哀”上来,即深层置根于日本自古以来的传统。而芭蕉的“本意、本情”恰又从李白、杜甫等中国诗歌的“本意、本情”多有吸取,实际中国文化也是极为重视“本意、本情”的。正是这样,川本一头牵住宗祇(古代日本诗人),一头牵住杜甫,而另一头牵住日本的广大读者,甚至后世的读者,从国际的眼光,正尝试对芭蕉的“永久革命”——不断向现代发出信息的芭蕉俳句的活力重新解剖。

芭蕉有一句有名的话是“不易流行”。所谓不易就是不变,讲的是诗的基本方面的永远性,流行则是不同时期的新风诗体,因为它们都是出自所谓“风雅之诚”的,所以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川本曾借用这句话来强调文学研究创新的迫切性。他说:“‘不易流行’是芭蕉的至理名言。人们所做的事情,是永远不变的,同时又是随时在变的。文学在永不满足地唱着‘同一首歌’,另一方面不新则又不是文学,哲学似乎也是这样,我越来越感到,文学研究也是这样。”他这里强调的是研究创新。我想这是具有很强的针对性的。这首先是说那些照搬套用西方文学批评体系而又旨

在为片面证明本民族文学高于其他民族文学的思维定势,应该得到纠正,面对多元化文化共存的课题,应该有探索的勇气。东亚文学有自己独特的传统(包括汉文学传统),而又还有很多西方文学理论未曾包容的东西没有得到深入研究的机会,也需要通过创新研究来拓展。同时,正如川本先生所做的那样,这种创新又绝对不是空泛肤浅的标新立异,而是严格遵照学术规范,有坚实学术根基的继往开来的学术追求。

三

本书从日本诗歌的意象论、修辞论和韵律论三方面来探讨日本诗歌的传统。书中涉及到的是日本诗歌深层次的问题。在我国,对这些问题从事研究的学者人数还少,能够很好鉴赏和歌俳句的人也不算很多,但是,本书从世界文学眼光对传统文学进行阐释的方法,却可以给研究中国文学和外国文学的人某些有益的启示。

在日本学界,不仅研究本国文学(所谓“国文学”)和外国文学的人各守壁垒,相互隔膜的现象比较严重,就是在各自内部,除少数学者以外,也很少有破门拆墙、纵横驰骋的机会,同是研究日本古代文学的学者,研究奈良时代文学的和研究平安时代文学的都少有沟通。川本先生却从中找出了他们的共性。他说:“本国文化研究和外国文化研究,看起来像是朝着正相反的方向,实际上相互却十分相似。更重要的是,它们都不过是从同一时代的相同要求中

产生并发展起来的。两者的根是一个,促使对这两者予以强烈关注的,笼统说来,是法国革命以后民族主义的高涨,是浪漫主义的民族、国家意识的尖锐化。在欧美,从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这一动向逐渐增强。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它又作为真正的学问领域形成了制度。而且这一大潮,也直接波及了受到欧洲帝国主义威胁而被迫近代化的东亚。”他列举了这在日本文学研究中的种种表现之后,表达了对东亚今后本国文化和外国文学研究的期待,那就是首先要丢掉近代式的事大主义,不仅向西方寻求范式,而是自觉认识到东亚独特的立场、本国固有立场,加强出自自身的、主体性的关注与判断的研究(《事大主义的两副面孔——日本的日本文学研究和外国文学研究》,在北京大学的讲演,拙译)。

显然,《日本诗歌的传统》便是力图从日本文学自身提出的课题,而不是仅仅照搬某种外来理论的“套装”。川本对“秋暮”意象的分析,让我们想起钱钟书先生在《管锥编》中对《诗经·君子于役》等中国古典诗歌“暝色起愁”取景造境艺术手法的分析。两者都是牢牢立足于本国文学而又具有世界文学的宏阔视野,而不同的是,钱先生方法中不乏中国古典诗歌摘句举篇方式的长处,而川本则更显示出专注于精细处的日本式的手下功夫。对于看惯时兴的调门越唱越高、招牌越打越大而耐人寻味的东西越来越少的某些文章的人来说,从川本论著里看到的确是别样的作派。

比较文学研究者乐此不疲的实际上就是两件事,一是

以比较的观点来考察外国文学,以益国人“美人之美”,即理解别种文化;二是从国际视野来阐释本土文学,以益持另一种文化的人“美我之美”,即向世界展示本国文化。这两件事实际上是密不可分的。在今天这个所谓“国际化”时代,后一种工作的重要性越来越突显出来。川本先生所说的“警戒感”和“敏感性”,正是意识到这一点。一种文化要不被另一种漫天盖地的强势文化吞噬,就要不断奋进显示她的活力,也要让更多与她隔膜的人与她亲近起来。川本先生向外国读者做了阐释日本诗歌传统的工作,他的著作被翻译成英文,受到好评。中国学者也面临着类似的任务,就是如何让没有汉文化修养的外国人理解中国文学艺术的传统。我向日本的大学生研究生讲授中国古典诗歌的经验告诉我,这件工作是十分艰巨的,靠我们现有的本领往往难以胜任,而这又是不能不做好的。

为了真正能够做好益国人“美人之美”、益他者“美我之美”的工作,光有学者努力是远远不够的,还要有教育、出版以及政府各部门的有力支持。川本先生本书的英文版就是在日本出版的。就中国文化研究而言,呼吁政府采取资助国外优秀青年中国问题研究者来华研究、资助中国典籍在国外的翻译出版、有选择地援助外的中国文化研究机关等措施,以推进世界认识中国的事业,固然不是本书译者序的任务,但笔者愿借此数行,表达一下自己对此事业的热切期盼。